

# 东盟-海合会经贸合作关系: 现状、基础及特点

钮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上海 200083)

**摘要:** 东盟与海合会之间从早期的零散经济接触发展到深入的以“粮食换石油”为核心内容框架、多类商品贸易为基础的经贸合作领域; 在此过程之中, 东盟和海合会内部分别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 并且建立东盟-海合会自由贸易区开始成为双方的共识, 新加坡-海合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随之而来马来西亚的诉求可以视作渐进式推进东盟与海合会关系发展的具体步骤。不仅如此, 东盟与海合会之间的制度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双方部长级会议已经成型, 互派大使也将实现。所有这些对于进一步保障东盟和海合会的安全利益有着切实的积极意义。东盟-海合会自由贸易区未来的建立将会成为全球诸多自由贸易区之间相互连接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 东盟; 海合会; 经贸合作; 粮食和石油; 自由贸易区

**中图分类号:** F13/17 3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11)01-0036-08

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GCC) 分别是东亚地区和中东地区发展最为成熟的地区组织, 其发展历程都经历了从政治和安全组织向经济组织拓展。从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 东盟整合了 10 个成员国的经贸发展,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更是推进了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海合会则协调了 6 个海湾石油君主国的发展步伐, 两个地区组织对于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自由贸易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区域经贸合作的角度来看, 东盟以集体的名义与中日韩 3 国建立了“东盟 10+ 3”的机制, 该机制涉及发展与合作等议题, 覆盖了绝大部分东亚国家 (朝鲜除外), 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也于 2010 年 1 月 1 日全面启动, 不仅如此, 东盟 6 个成员国还参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盟成为连接东亚、大洋洲以及美洲国家经贸合作关系的核心国家。海合会一方面与中东其他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地中海沿岸中东国家加强早已有之的经贸联系, 在欧盟-地中海合作框架以及建立欧地自由贸易区的计划之下, 海合会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区计划也在断断续续的谈判之中, 海合会对于连接地中海沿岸中东马格里布国家和黎凡特国家以及欧盟国家也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正因如此, 东盟与海合会近年来经贸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成为连接世界经济以及各自由贸易区的有力推进器。东盟与海合会的经贸合作是第三世界国家南

收稿日期: 2010-01-2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中国在中东 (西亚北非) 地区的国家利益研究” (2009JJD810010); 上海市重点学科 B702

作者简介: 钮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博士。

南合作的典范,对于传统的依附论、“中心-外围”论等是一种突破。

## 一、东盟与海合会经贸合作关系的由来与现状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人民之间的贸易往来以及一定数量的投资活动越来越明显。1986 年,海合会部长会议第十八次会议同意与远东国家尤其是东盟和韩国进行初步的接触。但 1990 年以前,东盟与海合会没有建立官方的接触机制,主要通过联合国大会的管道进行临时性会晤,其合作极为有限。1990 年以来,东盟与海合会建立了日常的联系机制,但两个组织内部经济一体化进程步伐的缓慢影响了双方经贸合作的深入以及官方联系的层次。尽管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于 1992 年建立,但东盟本身也在扩大过程之中,直至 1999 年柬埔寨加入才宣告完成,而海合会直至 2003 年才建立海合会关税同盟,2008 年启动海湾共同市场。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从海合会到南亚与东盟的资本流动包括建立在非正式双边及官方的多边基础上的汇款、财政援助与发展援助,银行间交易以及高净值公民个人的组合投资。”<sup>[1]</sup>

东盟与海合会关系的突破出现在 2000 年 2 月,海合会总谈判协调员访问东盟总部并会见了东盟秘书长,双方探讨了海合会国家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前景。作为回访,由部分东盟国家驻沙特大使组成的东盟委员会访问了海合会总秘书处,双方讨论了经济合作等方面的问题。2007 年 4 月 21 日,东盟秘书长王景荣与海合会秘书长阿卜杜勒拉赫曼·阿蒂亚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会谈,涉及双方共同关注的地区与国际问题。王景荣强调:“我们寻求推进秘书处对秘书处级别的合作。东盟正与海合会一道开发不同部门的合作方式。”<sup>[2]</sup>2008 年 7 月,东盟国家外长第四十一次会议决定谋求海合会国家外长同意建立一种年度外长会议为形式的正规化机制,海合会对此做了积极回应。2008 年 9 月,东盟秘书长素林·披素旺访问海合会时在沙特指出:“随着世界范围内油价的上涨以及对粮食短缺的越来越多的关注,东盟与海合会形成共识,即可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以及有关这两个地区问题的更紧密的协调”,海合会秘书长阿蒂亚指出:“我看到我们东盟-海合会增强的合作中有大量潜力”。<sup>[3]</sup>在东盟与海合会约定来年的部长级会议举行之前,2008 年 8 月 21 日,海合会国家政府间商贸组织“海湾国家商工联合会”(FGCCC)以及“国际海合会贸易中心”在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MIDA)设立“海合会-东盟经济中心”(GAEC),该中心作为这两个机构“唯一的官方代表机构”。不仅如此,它还“从海合会获得必要的支持”。“海合会-东盟经济中心”的宗旨在于:(1)“加强海合会与东盟成员国之间双边与多边经贸关系”;(2)“引导一切在以下领域建立联合企业和合作伙伴关系的努力:石油与天然气;贸易;金融(银行、投资、保险);食品与农业;房地产;教育;其他(如信息技术、旅游等)”;(3)“扮演这两个地区国家间催化剂和桥梁的角色”;(4)“通过明确的机会和采用共同利益的合资企业去创造经济与社会活动所有领域的思想与计划,以增强这两个地区国家间经济活动的发展”。<sup>[4]</sup>从具体合作的服务对象来看,主要针对东盟与海合会国家中在“海合会-东盟经济中心”注册的政府机构、政府有关的公司、私营公司以及商人;从服务内容来看,主要包括:招标分配;组织相关政府机构与公司间的会议;建立商业配对和网络计划的伙伴关系;进行可行性研究;介绍促进合同谈判的解决方案;法律、文秘和会计服务;进出口及清关服务;为酒店、餐厅和机票提供特价优惠安排;进入海合会的签证与入境许可;为协商与会议提供指导方案和翻译服务;在获认证的培训机构为会员单位及其雇员举办研讨会和实施培训计划;访问所有注册会员及其活动的数据库;通讯与公告服务;海合会与东盟当地市场、规则和法规的信息。<sup>[5]</sup>

正是在长期以来双边经贸合作框架的基础之上,东盟与海合会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便水到渠成。2009 年 6 月 29 至 30 日,首届东盟-海合会部长级会议在巴林举行,东盟与海合会国家部长、高级代表以及双方秘书长出席,旨在“发展更紧密和更有益的关系”,目标在于“建立东盟-海合会合作

框架及贸易协定的可能性,促进人民之间的联系与旅游业”,东盟与海合会互派大使也提上了议事日程。<sup>[6]</sup>在《联合声明》中,双方“强调了依据国际法打击海盗的重要性”,“认识到贸易和投资的潜力”,“强调两个地区的私营部门通过促进东盟-海合会商业论坛来紧密合作的必要性”,“认识到食品安全及发展农业生产、供应和食品标准领域——包括清真食物产品——合资企业的重要性”,“注意到在能源部门,包括烃能源和可替代、可再生能源信息交换方面合作的潜力”,“表达了对当前财政和经济危机的关注并认识到对双方不可避免的影响”,“同意建立官方网络以及旅游相关活动的推进和规划”。双方还约定签署《海合会-东盟 2年工作计划》,并决定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于2010年在东盟国家举行。<sup>[7]</sup>东盟对深化与海合会的合作表现积极,2009年12月,东盟轮值主席国泰国商务部长彭提娃·纳卡塞会见阿联酋代表时指出:“对东盟-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研究已基本完成。如果它们发现自由贸易协定(FTA)将对双方产生积极后果,那么双方应同意尽早开始谈判。”<sup>[8]</sup>2010年2月28日,第十六届东盟经济部长务虚会主席伍辉煌指出:“部长们鼓励官员和东盟秘书处组织与海合会进行圆桌讨论,并呼吁他们在可能的领域和地区参与机制集思广益。”<sup>[9]</sup>2010年4月11日,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在沙特协商会议发表演讲时指出:“亚洲国家依靠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地区来确保其能源需求,而海湾国家正瞄准食品进口与投资农田以确保其战略食品供应”,“你们拥有我们所没有的,而我们拥有大量你们所没有的,因此我们必须携起手来”。<sup>[10]</sup>2010年5月16日,由柬埔寨和科威特主持的东盟-海合会会议在利雅得举行,该会议审阅了2010至2012年行动计划,并讨论了即将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部长级会议的议程等。

## 二、东盟与海合会经贸合作关系的基础

东盟与海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的初步接触到如今已经相对成熟,从东盟与海湾具体国家之间的单向合作发展成为东盟与海合会之间的双向互动,这得益于东盟和海合会双边共同的合作基础,东盟与海合会经贸合作关系的建立最重要的考虑在于寻求自身安全的保障,尽管东盟与海合会自身既非所在地区事务的引导力量,更非国际事务的主导力量,但双方试图通过多边外交框架内加强双边关系,以间接促进自身安全与和平的实现。对于东南亚国家和海湾国家而言,其安全感的缺失是天然的。这种以国家安全战略为核心的合作基础主要体现在两个具体的方面。

第一,多数东南亚国家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分别被整合在东盟与海合会框架之下,东盟与海合会内部的和平与稳定为两个组织之间的经贸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泰国外,东南亚国家之前皆为殖民地,虽然已获独立,但“由于被殖民者创造的领土边界内混居着大量不同族群的民众,精英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是内部的,这些问题集中在族群分裂主义诉求对国家领土完整的挑战以及共产主义暴动者对政权的挑战。”<sup>[11]</sup>东盟在此种情形下,尤其是出于反共需求而于1967年8月正式成立。最初作为军事政治组织的东盟并不能完全消除内部的族群分离主义以及共产党势力的壮大,其从属于美国安全利益的意识形态倾向难以吸收并代表所有东南亚国家,反而造成了东盟与中国、朝鲜以及印度支那3国之间的长期对立,而这些国家也支持东盟国家内部的共产主义势力。不难看出,此时的东盟并不能实现东南亚国家内部的和平与安全,尽管其成立时的宗旨包括“加快该地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sup>[12]</sup>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之后,东盟国家与中国关系有了较大改善,东盟从70年代开始积极谋求走出意识形态对抗的道路以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的东南亚。冷战的结束更是为东盟吸收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创造了历史的机遇,东盟越发向经济贸易组织转型。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成员国之间得到建立,东盟还积极改善与周边大国的关系,如东盟地

区论坛旨在实现东盟规范的地区秩序。东盟的扩大及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协商一致、灵活性原则与政府间合作的“东盟方式”。在海湾地区,除沙特较早获得主权国家地位之外,其余国家长期沦为殖民地,尤其是海湾5国,英国直至1971年才完全退出。海湾君主国在70年代与伊拉克和伊朗关系较为平稳,但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拉克萨达姆的掌权以及随后的两伊战争的爆发使得海湾君主国面临着直接的不安全因素的威胁,在此种情形之下,海合会于1981年5月应运而生。因与东盟国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地缘政治以及历史文化的不同,海湾君主国内部相对较为稳定,不存在民族矛盾,只有少量的教派冲突,共产主义的影响微乎其微,君主国之间只存在少量因殖民主义而留下的领土争端,因此其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地区大国。正因如此,海合会作为经济贸易组织而建立,其目标在于加快成员国之间经济一体化从而推进政治一体化进程,形成合力而成为海湾一极。不难看出,东盟和海合会分别都在迈向阿米塔·阿查亚所言的“安全共同体”,即“发展出一种长期的和平交往习惯且与本组织其他成员国解决争端时排除动武的一组国家”。<sup>[13]</sup>正因为东盟已吸收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除东帝汶外)、海合会涵盖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大多数(除也门和伊拉克外),东盟与海合会最大限度整合了所在地区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具有极高的代表性,东南亚国家与海湾国家开展整体性地区间经贸合作成为可能。

第二,东盟与海合会的经贸合作实践了“经贸促和平”的自由主义理念。东盟与海合会各自内部安全与和平的逐步实现遵循了自由主义理念。在此基础上,这种内在经验呈现出外溢趋势,东盟与海合会均将与其他国家和组织间的经贸合作视作实现彼此间长久和平的重要武器,这与理查德·罗斯克莱斯的贸易国理论十分契合。在全面分析了“政治军事世界”和“贸易世界”国家的差异之后,罗斯克莱斯按照逻辑发展提出了贸易对于军事碰撞的规避,即贸易国家“可以通过世界范围市场的商品与服务支撑的内部经济发展而非试图征服和同化大片的土地做得更好”,“只有贸易世界所代表的互惠交易和劳动分工可以在如此无政府状态中避免冲突”。<sup>[14]</sup>由此可见,在罗斯克莱斯看来,由领土体系而来的军事政治世界和由海洋或贸易体系而来的贸易世界,前者是战争的世界,后者是和平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并无高低之分,只有观察的逻辑起点的差异。贸易国家(trading state)通过经济方式进行对市场的征服,这与传统战争国家通过军事政治方式进行对领土的征服所导致的战争结果截然不同,即罗斯克莱斯所认为的经贸促进和平。东盟与海合会的经贸合作并非消除彼此间的安全威胁,而是东盟与海合会互为对方对外战略尤其是安全战略的一环。与美国尤其是小布什时期“外力促民主、民主促安全”、欧盟的“经贸促民主、民主促安全”所不同的是,东盟与海合会都拒绝在经贸合作与和平安全之间设置中间步骤,这与这两者的非西方背景有着巨大关联。

首先,双方都反对使用外力施压,尤其是武力来实现和平与安全,东盟从早期的军事安全组织向经贸组织彻底转型便说明了问题,海合会在坚守肇建迄今经贸组织属性的同时适度加强军事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合会走上了战争国家的道路,而是对非贸易世界挑战的回应。其次,双方都反对将美式或欧式民主作为迈向和平与安全的中间步骤。这与东盟、海合会的特质有关,东盟内部在国体上包括总统制、君主制、议会制、军人政府等,民主政治上包括民主国家和民主进程中的国家,文明类型上包括儒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以及共产主义文明等,因此,东盟未能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尤其是对西式民主的普遍认同。海合会国家皆为阿拉伯君主国,从成立之初便是伊斯兰教为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观共同体,海合会国家内部虽具有协商制、金议制等伊斯兰民主,但与西方民主观有着很大不同,甚至与什叶派民主观也有很大的不同。霍梅尼就认为:“君主制等同于伪神、偶像崇拜和在地球上传播腐败”<sup>[15]</sup>,海湾国家的君主制显然是不符合霍梅尼的民主要求的。无论是东盟还是海合会都因自身价值观因素而难以赞成美国或欧盟的民主和平论,而是赞成贸易和平论。

### 三、东盟与海合会经贸合作关系的特点

东盟与海合会的经贸合作关系基于共同的成熟的地区经贸一体化实践以及“经贸促和平”的自由主义理念,经过数十年渐进式的接触与磨合,已逐步成形。具体而言,从合作的主导者、合作的领域、合作的方式等方面来看,东盟与海合会的经贸合作是小国联合自强主导彼此间合作的典范,其双边合作涉及油气资源、农产品等,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东盟-海合会自由贸易区,在此过程中呈现出显著特点,即东盟与海合会间双边关系为引导,东盟具体国家和海合会具体国家的多管道合作为基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东盟与海合会自由贸易区谈判为终极目标,东盟具体国家与海合会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为先行。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参与全球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表现层次不一,由低到高可分为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货币联盟、货币与经济联盟、完全经济一体化等,而最常见的形式是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自由贸易区是“通过一组国家为消除它们之间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商品的贸易壁垒而建立”,“通常是地区性的,出于地缘的考虑”,“也可出现在彼此相隔遥远的国家之间”,“不一定让各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关税整齐划一。”<sup>[16]</sup>东盟业已建立起东盟自由贸易区,而海合会也建立起发展层次更高的海湾共同市场,并正在向货币与经济联盟迈进。建立与其他地区组织或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区是东盟和海合会的现实选择。2010年元旦建成的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是东盟参与建成的首个自由贸易区,而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区和东盟-日本自由贸易区将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建成,东盟与印度、新西兰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在东北亚、南亚及大洋洲主要邻国建成或即将建成自由贸易区之际,东盟呈西进态势。海合会则与中国和欧盟正在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不难看出,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对象目前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而海合会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东亚的中国。除中国外,双方的对象国不尽相同,因此,东盟与海合会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对于连接东南亚和中东,甚至促进欧亚非的自由贸易极有裨益。2009年12月世贸组织部长会议期间,东盟轮值主席国泰国的商业部长纳卡塞(Pomtiva Nakasa)与阿联酋的代表讨论了东盟与海合会之间贸易自由化的问题,纳卡塞指出:“对东盟-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研究基本完成。双方应同意尽快开始谈判,假如它们发现自由贸易区将为彼此创造一个积极的结果。”她还指出,阿联酋支持尽快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sup>[17]</sup>2010年4月11日,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呼吁在东盟与海合会之间尽力“建立自由贸易区”。尽管东盟与海合会自由贸易区尚未建立,但彼此之间存在着优势互补,东盟存在着与具体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成功经验,而海合会有着与地区组织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经验积累,这对于这两个地区组织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会有极大的帮助。

东盟与海合会之间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是双方领导人的共同追求,但双方也明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并不能一蹴而就。在东盟-海合会自由贸易区作为终极目标的前提下,东盟的一些国家已与海合会建立了自由贸易区或正在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新加坡-海合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整个东盟国家的先导。2006年11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访问沙特期间正式与海合会商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问题,2008年12月15日,新加坡正式与海合会在多哈签署自由贸易协定(GSFTA),这是海合会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涉及商品贸易、投资、劳务人员流动、海关手续和政府采购等多个领域,但具体细节仍待海合会成员国逐一修改后确定。新加坡外长杨文荣2010年3月访问迪拜时与海合会有关国家政府官员确定,新加坡-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将在2010年晚些时

候正式实施。杨文荣的访问不仅是为了 2010 年 5 月底即将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东盟 - 海合会部长级会谈作准备,其具体目标还在于推进东盟与海合会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进展。杨文荣指出:“事实上,新加坡所期待的将不仅仅是新加坡与海合会之间的未来的协定,而是东盟与海合会(之间也将有此协定)”。<sup>[18]</sup>新加坡成为东盟国家中首个与海合会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国家并非偶然,这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度等息息相关,新加坡是东盟 10 国中经济水平最高的国家。2009 年下半年,马来西亚在新加坡的启发下,开始萌生与海合会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想法。2010 年 3 月,马来西亚正式表示愿与海合会开始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部长穆斯塔法指出:“我们认为与海合会的自由贸易协定对于进一步增强马来西亚与该地区商业机构间的联系确有必要”,“马来西亚已与海合会秘书处进行了交谈,但严肃的谈判迄今尚未开启”。<sup>[19]</sup>尽管马来西亚将伊斯兰金融等作为其与海合会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目前只有阿联酋明确表态支持马来西亚 - 海合会自由贸易区。由于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就许多国家而言,与海合会建立自由贸易区十分艰难,但诸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努力对于东盟与海合会未来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应该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其次,东盟与海合会之间分别以油气资源和农产品为最迫切的需求,这构成了双边贸易的主导,而东盟国家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多渠道、多领域经贸往来则构成辅助性经贸合作方式。

就东盟与海合会主导的粮食换石油贸易而言,这两种贸易商品皆非普通意义上的贸易品,而是具有战略和安全意义的特殊商品。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命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非常重视粮食的自给自足或稳定粮食来源的确保,不仅如此,粮价的波动对于产粮国和粮食需求国都会有巨大的影响和连锁反应。“国际社会对粮价上涨的密切关注和担忧揭示了粮食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和安全问题。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任何关键性的因素波动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粮食问题便是其一。”<sup>[20]</sup>海湾阿拉伯国家由于所处地理位置而深刻感受到粮食安全的紧迫性,这种不安全感会诱发以下问题:“引发社会群体心理不安,破坏社会稳定基础”,“引发社会冲突,激化社会矛盾”,“导致政治依附性增强,国际话语权受制”。<sup>[21]</sup>海合会国家除沙特外多为小国,国土内多为沙漠地带,可耕地面积较少,这是农业的先天不足;水资源的稀缺和人口的大量增长对于农业的发展以及粮食安全是致命的冲击。“该地区可利用的纯净水资源低于全球可利用纯净水资源的 1%”,“然而,该地区是世界 5% 的人口之家”,“海合会总体人口增长率——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在 1990 年至 2009 年之间为 3%。”<sup>[22]</sup>海合会国家与以色列的地理状况极为类似,但出于对以色列的不信任感而未将学习以色列的先进农业技术作为首选,而是利用其丰富的石油美元在全世界购买粮食以分化粮食安全风险,东盟国家因所处地理位置而有着丰富的农业资源而成为海合会国家购买粮食的重要地区。石油是工业的血液,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并向全球拓展以及全球产业分工的重新布局,新兴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离不开石油。尽管东盟国家如越南、印尼等也有一定的油气产量,但远远不够东盟国家自身的发展需求。不仅如此,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的争端对于其目前的石油产品生产具有潜在与现实的威胁。而海合会国家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无论是美欧还是中日韩都在此角力,就东盟各国而言,与这些大国在海湾地区的竞争毫无优势,以东盟的身份与海合会加强油气贸易成为首选。2009 年 3 月 1 日,新《东盟石油安全协议》(APSA)正式取代 1986 年的旧协议,其核心内容在于维护东盟石油资源的独立性。正是在东盟与海合会各具优势且需求互补的前提下,双方加强了在农业和石油贸易方面的合作。2009 年 6 月东盟与海合会首次部长级会议中便有石油换粮食的计划,海合会便打算从进口粮食变为直接投资东盟国家的农业生产以实现双赢。“亚洲国家依赖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出地区以确保它们的能源需求,与此同时,海湾阿拉伯国家正在瞄准粮食进口与农田投资以确保它们的战略粮食供应”,泰国外长甲西·披龙耶的话表明了东盟的立场:“我们可以保证海湾地区未来

10年任何数量的大米消费。”<sup>[23]</sup>

在东盟与海合会最为迫切的粮食与石油贸易紧锣密鼓地筹划之时,东盟国家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多领域双边贸易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缅甸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农业贸易便极为成型:2008年8月,缅甸与科威特签署贸易和投资协定,旨在促进科威特投资缅甸农业;2009年9月,缅甸与阿联酋迪拜贸易促进会(DMCC)谈判关于缅甸向阿联酋出口10万吨大米事宜。越南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其20余年革新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对海湾出口包括粮食、生活用品以及工业品之外,还包括劳务输出。截至2008年,越南在中东的劳工有约21000人,其中卡塔尔10000人,阿联酋9000人,沙特2000人;不仅如此,卡塔尔还与越南签署协定,将2008年吸收越南劳工的数量扩大至20000人,今后数量将逐年增加。<sup>[24]</sup>近年菲律宾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十分频繁,海湾国家商工联合会秘书长纳奇2009年6月访问菲律宾与阿罗约总统会见后指出:“阿罗约总统在我们的会议中表明了扩展与海合会在所有领域,尤其是贸易、投资和劳动力部门合作的愿望。”<sup>[25]</sup>具体体现在:菲律宾与海合会国家私企之间的双边合作正在扩大;海合会通过合作公司的形式投资菲律宾农业,尤其是建立合资企业生产清真食品以出口海合会国家;海合会增加对高素质菲律宾劳工的吸收,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熟练技师。马来西亚是伊斯兰国家,这与海合会国家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在全世界穆斯林国家之中,海合会国家近年来成为马来西亚最主要的贸易伙伴。马来西亚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自1999年以来开始增长,2003年达到30亿美元,2006年为80亿美元,其中70%的双边贸易额来自沙特和阿联酋。<sup>[26]</sup>马来西亚侧重于几个方面的经贸往来:国际清真食品中心的建设,马来西亚投资1亿林吉特建造清真公园;旅游业,海合会国家游客数量从2001年至2007年持续增长100%;海合会国家加快在马来西亚开设伊斯兰银行的分支机构,沙特拉吉哈(Ahrajhi)银行和科威特金融公司(KFH)是其中最为知名的银行<sup>[27]</sup>;服装业,马来西亚时装批发进出口商会总会长洪细弟就指出:大马时装业于“2010年在面对零关税实行下,要冲出东盟国家,往中东国家发展”,“在零关税下,进口的原料便宜,制造后出口就会更有利,尤其是把时装出口到把大马视为回教国而没有征税的中东国家。”<sup>[28]</sup>

#### 四、结语

东盟与海合会都成为各自地区的一股新兴力量,在当前国际社会区域经济一体化成燎原之势时,区域经济组织之间的经贸合作成为新的动向。东盟与海合会之间从早期的零散经济接触发展到深入的以“粮食换石油”为核心内容框架、以多类商品贸易为基础的经贸合作领域。在此过程中,东盟和海合会内部分别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在现有经贸合作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建立东盟-海合会自由贸易区开始成为双方的共识与未来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方向。新加坡-海合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及随之而来的马来西亚的诉求可以视作渐进式推进东盟与海合会关系发展的具体步骤。不仅如此,东盟与海合会之间的制度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双方部长级会议已经成型,互派大使也将实现。所有这些对于进一步保障东盟和海合会的安全利益有着切实的积极意义,这说明东盟与海合会经济外交和政治外交对象逐步从本地区或邻近地区向其他地区拓展,其着力点从世界大国向中小国家拓展。未来东盟-海合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会成为全球诸多自由贸易区之间相互连接的重要一环,对于中国的意义尤为明显。东盟与海合会是中国对外经贸合作至关重要的两大组织,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建立之时,尽快达成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区协定不仅对中国国家利益极为有益,对促进东盟与海合会之间的经贸合作也会有直接的推进作用。

## 注释:

- [ 1 ] Rodney Wilson,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GCC and South and South East Asia”, in Hannah Carter, Anoushiravan Ehteshanji eds., *The Middle East Relations with Asia and Russia*, Routledge Curzon, 2004, p. 113.
- [ 2 ] Ghazanfar Ali Khan, “GCC, ASEAN, Set Out Visions of Cooperation”, *Arab News*, April 22, 2007.
- [ 3 ] “ASEAN-GCC to Elevate Relations to Regular Ministerial Meetings”, September 17, 2008, <http://www.aseansec.org/21950.htm>.
- [ 4 ] GAEC, “About Us”, at <http://gccaec.com/index-1.html>
- [ 5 ] GAEC, “Services”, at <http://gccaec.com/index-3.html>
- [ 6 ] ASEAN, “First ASEAN-GCC Ministerial Meeting”, June 30, 2009, <http://www.aseansec.org/PR-1st-ASEAN-GCC-MM.pdf>
- [ 7 ] ASEAN, “Joint Press Statement The First ASEAN-GCC Ministerial Meeting”, June 30, 2009, <http://www.aseansec.org/PR-JPS-1st-ASEAN-GCC.pdf>
- [ 8 ] Petchanet Pratuangkraj “ASEAN, GCC Likely to Start FTA Talks Soon”, *The Nation*, December 4, 2009.
- [ 9 ] “AEM to Promote Greater Understanding with GCC&MERCOSUR”, *Bernama*, February 28, 2010.
- [ 10 ] Ghazanfar Ali Khan “Stronger GCC-ASEAN Ties Pledges”, *MENAFN*, April 12, 2010.
- [ 11 ] Alan Collins, *Security and Southeast Asia: Domestic, Regional and Global Issue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3, p. 129.
- [ 12 ] ASEAN, “The ASEAN Declaration, Bangkok”, August 8, 1967, <http://www.aseansec.org/1212.htm>.
- [ 13 ]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Routledge, 2001, p. 1.
- [ 14 ]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Basic Books, 1986, p. 25.
- [ 15 ] Ervand Abrahamian, *Khamenei: Essays on the Islamic Republi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24.
- [ 16 ] Kenneth A. Reinert, Ramesh S. Rajan, *The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the World Economy*, Vol 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02.
- [ 17 ] Petchanet Pratuangkraj “ASEAN, GCC Likely to Start FTA Talks Soon”, *Nation*, December 4, 2009.
- [ 18 ] Jumana Altanini “Singapore Wants Free Trade Pact for GCC and ASEAN”, *Gulf News*, March 23, 2010.
- [ 19 ] Abdul Basit “Malaysian Keen to Boost Business Ties with GCC”, *MENAFN*, April 14, 2010.
- [ 20 ] 钮松: “‘手中无粮 心中发慌’的影响”, 《新京报》2008年4月13日。
- [ 21 ] 陈杰: “试析阿拉伯粮食安全问题”, 《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2期。
- [ 22 ] Shuchita Kapur, “Fresh Water Infrastructure Vital for GCC”, *Emirates Business* 24/7, 2009-11-05.
- [ 23 ] Frederick Richter “GCC, ASEAN Eye New Trade Bloc Based on Food, Oil”, *Arabian Business*, 2009-06-30.
- [ 24 ] “Middle East Needs More Vietnam Workers”, 2008-01-18, <http://english.vietnamnet.vn/social/2008/01/764782/>.
- [ 25 ] Joe Avancena “GCC, Philippines Launch Economic Cooperation”, *Saudi Gazette*, 2009-06-13.
- [ 26 ] [ 27 ] Anak Binti Ab Rahman, Mohd Fauzi Bin Abu-Hussin “GCC Economic Integration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for Malaysian Econom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Research*, Vol 2, Fall 2009, pp. 50-52-53.
- [ 28 ] “零关税: 零关税·物品会降价吗?”, 《星洲日报》2010年1月6日。

[责任编辑: 柳弘]

(下转第 53页)



# A Stud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ies in British Malaya

TSAO Shu-yao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Tunghai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Accompanying the coming of western powers' nationalism which stresses the ultimate and exclusive political loyalty to the building of "nation-state" has prevailed in Asia since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terestingly, Chinese who migrated to the British Malaya had developed a double national identity, not the exclusive national identity stressed by western countries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British Malaya

---

(上接第 43页)

##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NU Song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Abstract** The ASEAN and GCC had scattered relationship in the early period, and then they shared the deep multi-commodity trade-based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ith the "food for oil" a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framework. In this process, the two sides established the free trade area and common markets respectivel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GCC Free Trade Area became their consensus. The Singapore-GCC Free Trade Area and the Malaysia's aspirations can be regarded as progressive concrete steps of the ASEAN and GCC. Besides, there was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institution building between ASEAN and GCC, which had formed 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and achieved the exchanges of ambassadors. All of those have a real positive meaning to further protect security interests of the two organizations. The ASEAN-GCC Free Trade Area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for other area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ASEAN, GCC,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food and oil, free Trade Area